「整理國故」運動的普及化

陳以愛*

一、前言

當五四新文化運動的高潮過後，中國知識界又掀起了一場「整理國故」的運動。¹自從胡適（1841-1962）在1919年撰寫〈新思潮的意義〉，將「整理國故」列為新文化運動的四項綱領之一，²並獲得北大同人熱烈響應，「整理國故」迅即成為一句學術新口號，北大且於1922年成立研究所國學門（以下簡稱

* 政治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班研究生

1 本文所謂「知識界」，主要採蔣夢麟在20年代對「知識階級」所界定之範圍，包括以下四種人：（1）「投身教育事業者」；（2）「出版界的作者和編輯者」；（3）「操必以高等學術為基礎的職業者」；（4）「散於各界中之對於學術有興味者」。另外再加上大、中、小學的學生。蔣夢麟，〈知識階級的責任問題〉，收入：曲士培主編，《蔣夢麟教育論著選》（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5），頁263。

2 胡適，〈新思潮的意義〉，收入氏著，《胡適文選》（臺北：遠流出版公司，1986），頁41-50。

國學門)以實踐「以科學方法整理國故」的理想。³不但如此,就在數年之間,「整理國故」更以新一波學術文化「運動」的形式席捲全國,造成「上而名人教授,下而中小學生」,皆以「整理國故」相號召,⁴顯示一場新的「國學運動」⁵,已繼新文化運動之後成為知識界最引人矚目的一項事業。

「整理國故」能在新文化運動後吸引那麼多人投身其中,的確是一個值得探討的現象;該運動在中國現代學術思想史上的意義及其所造成的影響,也有必要作深入的研究與評估。不過,由於「整理國故」是一場涵蓋面極廣,參與人數也極眾的學術文化運動,因此本文僅集中討論下列問題:「整理國故」究竟是如何由一句口號演變成一場學術文化運動的?對於這場運動的形成與擴大,五四後生機蓬勃的出版業到底扮演了甚麼樣的角色?再者,當出版業加入到這場運動之後,其以牟利為主的特性,又是否會使「整理國故」的發展面貌發生某些轉變?對於上述問題的討論,本文主要就影響學術發展的外在機制方面著眼,以探討新式傳播媒介出現後學術理念傳播所呈現的新形態,以及由此而衍生的一些問題。因此,雖然五四前後中國學術思想的內在發展脈絡,為了解「整理國故」運動興起的不可忽略之因素,然此非本文論述的重點,這是首先要加以說明的。

二、報刊雜誌與「整理國故」運動的形成

本文所談的影響現代學術文化發展之外在機制,指的是19世紀以來,由於

3 關於北大同人紛紛投入「整理國故」工作的原因,以及北大國學門研究國故的成就,參拙著,《中國現代學術研究機構的興起——以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為中心的探討(1922-1927)》(臺北:政治大學歷史系,即將出版)。

4 郭沫若,〈整理國故的評價〉,收入胡道靜主編,《國學大師論國學(上)》(上海:東方出版中心,1998),頁79。

5 成仿吾,〈國學運動的我見〉,收入胡道靜主編,《國學大師論國學(上)》,頁158。

歐美新式印刷術傳入而引起的出版業革新,導致各類報刊、雜誌紛紛湧現;書籍的出版,更挾著龐大的資金而以前所未有的數量與速度推出。尤其到民國成立以後,隨著政治壓力的減弱,為知識界創造了一個相對寬鬆的外在環境;普及教育所造成知識人口的快速增長,又為出版界製造了龐大的圖書市場;以商務印書館(1897年創辦,以下簡稱商務)為代表的出版業,逐漸以現代「印刷工業」乃至「出版工業」的形態出現,⁶學術思想均賴此以傳播。論者早已指出,新文化運動之開展,固以著名學者為領袖,以全國學生為中心,而傳播新思想之主要媒介則為報刊雜誌。⁷新文化運動以後,每一波新思潮的產生,每一場學術文化運動的興起,亦都是以同樣的發展模式,藉由「文化工業」的配合而進行,「整理國故」運動也不例外。

事實上,新文化運動期間如雨後春筍般湧現的副刊雜誌,至20年代已為各省學子吸收新知的主要管道;其上所刊載之文章,亦輒成青年討論的焦點課題,學術風氣之變遷進退,要皆以此為指標。錢穆(1895-1990)謂彼時中學生「皆好縱讀新出雜誌報章,於並世學派思潮,尤喜分曹辨論,各抒己見」,⁸可見風尚之一斑。就在這個時候,從新文化運動的中心傳來北大同人「整理國故」的主張,經過這些報刊雜誌的刊載,遂吹皺了知識界一池春水。

由於當胡適在新文化運動中心的北大提出「整理國故」的口號後,北大首先成立一個以「整理國故」為宗旨的研究所,因此最早階段的國故整理工作,乃是以北大為中心而展開的。作為一個仿歐美學術機構而設立的研究所,國學門主事者在成立之初即了解到書刊出版對傳佈學術成果、提高機構學術地位的重要性,故先後發行了四種學術期刊,以及各種專刊、小冊子。在這些刊物

6 30年代初,已有人以「印刷工業」和「出版工業」來形容當時中國最具規模的出版機構——商務印書館。莊俞,〈三十五年來之商務印書館〉,收入商務印書館編,《商務印書館九十五年》(北京:商務印書館,1992),頁721。

7 李澤彰,〈三十五年來中國之出版業1897-1931〉,收入張靜廬輯註,《中國現代出版史料丁編下卷》(上海:中華書局,1959),頁387。

8 錢穆,《國學概論·新版附識》,收入氏著,《錢賓四先生全集》,第1冊(臺北:聯經出版公司,民87),頁5。

中，尤以《國學季刊》具有頗為廣大的銷售網，不但北京各書市均有代售，而且全國十四個主要城市：如上海、南京、廣州、成都等地，均有該刊之代售處；同時商務分佈在各省的支店，亦負起代售之責。⁹

不但如此，國學門同人更廣泛利用北京、上海地區之報紙副刊與雜誌，不時登載同人之主張和國學門之活動，以達到號召同志以及向社會宣傳的目的。當時，最為國學門喉舌的是北京《京報》副刊及《晨報副鐫》，這是因為先後擔任這兩份副刊主編的孫伏園（1894—1966）原為北大旁聽生，與北大師生關係密切。¹⁰上海方面，幾家重要的報紙期刊如《民國日報·覺悟》副刊、《時事新報·學燈》副刊、以及商務發行之《東方雜誌》和《小說月報》，或是刊載北大國學門的消息，或是登載北大同人及各方學者討論「整理國故」的文章，¹¹因此在1923年即有人指出：

適者報章揭載，雜誌印行，國學二字，雜見於篇什之間……。¹²

由於上述報刊雜誌不但在北京及上海知識界廣受歡迎，其銷售網更遍佈全國主要城鎮¹³，「整理國故」的主張藉此得以迅速傳播至南北各地，引起知識界廣泛的注意。

當時這些新興而具有廣大讀者群之報刊所以經常刊登北大教授之學術活動，固因該校在提倡文學革命的同時，復掀起思想革命的旗幟，要皆領導時代新風氣，其動向為全國知識界所注目；然而不可忽略的是，北大同人在新文化運動期間，親身體驗到傳播媒介在傳達新觀念方面之力量，故思有以利用之，

9 〈《國學季刊》代賣處〉，《國學季刊》，2卷1號（1925：12），底頁。

10 周作人，《知堂回想錄》（香港：三育圖書有限公司，1980），頁447-9。

11 例如：1923年2月的《小說月報》就開有一專欄，同時發表五篇討論「整理國故與新文學運動」之文章。參〈整理國故與新文學運動〉，《小說月報》，14卷1號（1923：2），頁1—13。《民國日報》則從1923年5月9日起，每週附帶發行一張由胡樸安、葉楚傖等國學研究社同人編輯之《國學週刊》，共出六十期。參：〈國學研究社簡章〉，《國學週報》，第2期（1923：5.1），頁1。

12 李宗焘，〈致劭力子先生信〉，《民國日報·覺悟副刊》，1923：5.29，頁1。

13 20年代初，《晨報》在全國十省共十四個城市皆設有分售處。參《晨報五週〔年〕紀念增刊號》，1924：1（訂正3版），頁底。至於商務印書館發行的《東方雜誌》，其銷售網更遍佈全國三十餘個主要城市（詳後）。

也是一個重要的原因。在國學門同人中，最了解也最善於利用新興報刊雜誌以宣揚其學術理念者，應推胡適和顧頡剛（1893—1980）。當「整理國故」的口號提出後，胡適不久便在自辦之《努力》外新設了一份《讀書雜誌》，一面向學者提供發表的園地以促進學術討論，一面希望由此而「引起國人一點讀書的興趣」，¹⁴其後胡氏許多相關論著即在其上發表。

至於在北大國學門長期參與期刊編輯工作的顧頡剛，對刊物之作用同樣有深切了解。觀其代胡適主編《讀書雜誌》時致錢玄同（1887—1939）的一封信上，曾特別闡明刊物與學術風氣形成之關係說：

我很希望先生把辨偽的見解多多在《努力》上發表。《努力》銷路很好，可以造成風氣。

我們說起了辨偽已有三年了，卻沒有甚麼成績出來，這大原故由於沒甚麼發表，可以引起外界的辨論，和自己的勉勵。如能由我這一封信做一個開頭，繼續的討論下去，引起讀者的注意，則以後的三年比過去的三年成績好了。¹⁵

顧頡剛因1919年時身處新文化運動中心的北大，曾參與《新潮》的編輯工作，深諳期刊雜誌在現代社會（包括知識界）所能產生的影響力，也明白文章的發表與公開討論可以引起外界的注意，有助新觀念的傳播與新風氣的形成。果然，當錢玄同和顧頡剛討論古史的信函在《讀書雜誌》上公開發表後，立即引起學界熱烈討論，所謂「古史辨運動」即由此揭開序幕，成為「整理國故」運動中重要的一環。

再者，當北大同人積極提倡「整理國故」的理念時，學界名流如梁啟超（1873—1929）、章太炎（1869—1936）基於不同的原因，於20年代初亦號召國人重視國故的整理與研究，也助長了這一風氣的瀰漫。當1922年章太炎在滬為

14 胡適，〈發起《讀書雜誌》的緣起〉，收入氏著，《最低限度的國學書目》（臺北：遠流出版公司，1994），頁19。

15 顧頡剛，〈致錢玄同函〉（1923：4.28），轉引自顧潮編，《顧頡剛年譜》（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3），頁82。

江蘇省教育會作國學講演時，報紙爲之大事宣揚，刊登廣告。¹⁶開講時則上海《申報》、《新聞報》、《民國日報》都派了記者在場記錄，¹⁷後復在報上刊錄講詞，¹⁸對知識界影響不小。梁啓超則先在1923年應《清華周刊》記者之請，爲撰〈國學入門書要目及其讀法〉一篇，翌年又將所著〈清代學者整理舊學之總成績〉交銷路較廣的《東方雜誌》連載。¹⁹章、梁兩位的提倡，經過報章雜誌的轉錄刊載，對「整理國故」事業自然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吳文祺在1924年便指出：

一二年來，整理國故的呼聲，可算是甚囂塵上了。……近來報章雜誌上也常常登載著關於整理國故的論文……。²⁰

到1927年，「整理國故」的聲勢更盛，對此不滿的陳源（1896—1970）描述當時的情形是：

國立大學拿「整理國故」做入學試題；副刊雜誌看國故文字爲最時髦的題目。結果是線裝書的價錢，十年以來，漲了二、三倍。²¹

由此可見「整理國故」之成爲知識界最熱門的課題，實與報章雜誌之配合有密切關係。

在「整理國故」聲浪日高的情形下，由於期刊均以登載國學文章爲時髦，因此就產生了大量討論國學的文章，以致人們漸覺有廣搜刊物以編輯「國學論文索引」的必要，於是20年代末就出現了北平圖書館所編的《國學論文索引初編》。其後因爲國學論文仍不斷湧現，遂又有《二編》、《三編》以至《四編》的出版。觀《國學論文索引初編》收錄的八十幾種期刊，不但大部份皆創刊於

16 湯志鈞編，《章太炎年譜長編》，下冊（北京：中華書局，1979），頁667-8。

17 曹聚仁，《我與我的世界（下）》（臺北：龍文出版社，1990），頁266、277-8。

18 1922年4—6月間，《申報》及《民國日報·覺悟》副刊均載有章太炎講詞之記錄稿。

19 丁文江，趙豐田編，《梁啓超年譜長編》（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頁992、1016。

20 吳文祺，〈重新估定國故學之價值〉，收入許嘯天編，《國故學討論集》，上冊（上海：上海書店影印，1991），頁30。

21 陳源，〈西滄跋語〉，收入胡適，《治學的方法與材料》（臺北：遠流出版公司，1986），頁163。

1919年後，而且部份更屬專門標榜國學的刊物。²²考察這些期刊的發行，其中固有藉此以自高其名者；所載之文亦復有前此已發表而又予以重載者；然觀其數量之多，仍不禁使人生「可謂盛矣」之嘆！²³

總而言之，到了20年代下半期，經過報刊雜誌的響應配合，「整理國故」的主張已從北京傳播到中國各地，「整理國故」的工作也成爲新文化運動之後，知識界積極投入的一項學術工作，以致當時就有人嘆說：

那「整理國故」的工作，是近來一重要部分知識階級的重要工作哪！²⁴

在學術新浪潮的席捲下，中國南北各個新興大學，像是東南大學、清華學校、燕京大學、廈門大學，皆繼北大之後成立以「國學」爲研究範圍的研究所（院）；其後一些院校也陸續開設了國學系、國學專修科，如輔仁、廈門、東北、西北、大夏、中國、齊魯、正風等校皆然。²⁵此外，各地成立的國學專門學校亦復不少，其中尤以無錫國學專修學校爲最有名。論者指出，從20—30年代前期，各地成立的標榜國學之學術性結社明顯增多，它們除了集中在北京、上海外，也遍佈西北、東北、閩粵乃至香港等地，²⁶顯示「整理國故」已成爲當時南北學人共同努力的一個新方向。

三、「有裨學者，兼利營業」的「整理國故」事業

固然，在「整理國故」事業初興之時，學者有利用報刊雜誌以宣傳其學術理念之意，然而出版業又何嘗不是熱切盼望與學者合作，以期在這場學術浪潮

22 〈本書所收雜誌卷數號數一覽〉，收入國立北平圖書館編，《國學論文索引初編續編》（臺北：鐘鼎文化出版公司影印，民56），頁1-9。

23 陳一白，〈中國今日之中國學術界〉，收入中國學術討論社編，《中國學術討論集》，第1冊（上海：上海書店影印，1991），頁176。

24 浩徐，〈主客答問〉，收入胡適，《治學的方法與材料》，頁165。

25 桑兵，〈晚清民國時期的國學研究與西學〉，《歷史研究》，1996年第5期（1996：10），頁37。

26 桑兵，〈晚清民國時期的國學研究與西學〉，頁37。

中獲利？當20年代之時，已有明眼人指出：「書賈射利」，實為國學書刊叢出的原因之一。²⁷的確，觀察整個「整理國故」運動發展的過程，可以發現學術界與出版業之間，呈現出一種互惠與互利的關係。

最明顯的例子，如亞東圖書館在20年代開始印行經過分段和標點的古典小說，請來胡適、陳獨秀（1879-1942）、錢玄同等在書前寫導言，既呼應了北大同人整理古書的理念，也為該出版社帶來可觀收益。²⁸而當亞東的新式標點本古典小說大銷之後，幾家大小書店如：大達、廣益、中央、群學社、大中、掃葉等，遂亦起而與之競爭，群出「標點本」小說；²⁹同時，從20年代末起，偷印盜版的情形日盛，反映出此類書籍的出版確是利可圖。競爭和盜印的結果，導致這類書價格低廉，結果促進了分段、標點的形式之流通。³⁰其時舉凡古代重要之文集或著述，幾乎皆有人將之標點分段，由書店重新出版，成為「整理國故」運動中的一項特色。

至於中國出版界之龍頭商務，基於商業利益和文化理想兩方面的考慮，也起而響應「整理國故」的號召。對於出版業在追求商業利益之餘，尚須兼顧發揚學術文化之責任，在中華書局和商務印書館工作過的呂思勉（1884—1957），³¹於1923年撰文指出：「今之人，每訾書店惟知牟利，不甚肯為學術文化計，此亦一偏之論。書店以營業為目的，與一切商店同。豈能責其只顧公益，不顧血本？苟如是，彼其資本，亦不轉瞬而盡耳，所能為者幾何？然雖如是，在無礙銷場之範圍內，書店亦應盡相當之責任」。³²呂思勉的話，頗代表當時出版業中具有一定文化理想者的看法。他並且以為：書店之編印某種書籍，原因自然在知其銷路必廣；然亦有某種書籍，其銷路亦可因書店之提倡而

27 陳一白，〈中國今日之中國學術界〉，頁176。

28 亞東圖書館標點重印古典小說之原委及暢銷情形，參汪原放，〈回憶亞東圖書館〉（上海：學林出版社，1983），頁56-65。

29 汪原放，〈回憶亞東圖書館〉，頁143。

30 汪原放，〈回憶亞東圖書館〉，頁141-3。

31 呂思勉，〈自述〉，收入氏著，〈呂思勉遺文集（上）〉（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7），頁437。

32 呂思勉，〈三十年來之出版界〉，收入氏著，〈呂思勉遺文集（上）〉，頁383。

廣。³³呂氏在同文中更針對當時方興未艾的國故整理事業立言，認為不論「為文化計」或是「為營業計」，出版機構在這方面倘經營有術，未始不能獲得成功。³⁴

當呂思勉提出上述意見時，商務在張元濟（1866—1959）主持下，基於保存國粹的考慮，已展開《四部叢刊》之編印計劃。³⁵而到「整理國故」聲浪日益高漲之際，國學書刊的編印，對館中主事者來說，顯然已成呂思勉所謂「有裨學者，兼利營業之事」，³⁶於是，一系列的出版計劃乃相應出爐。挾著龐大的資本，商務從20年代起陸續發行了三套「國學叢書」：即「國學基本叢書」、「國學小叢書」及「學生國學叢書」。它們在其後舉國出版業爭相發行之國學叢書中，部頭最大，銷路也最廣。單以重印古籍為特色的「國學基本叢書」而論，選印之典籍即達三百二十六種（1932年9月—1947年4月）。³⁷「國學小叢書」則收錄了二百一十二種書籍（1923年5月—1948年8月）。就是部頭最小的「學生國學叢書」，也有九十五種之多（1926年1月—1948年8月）。³⁸商務以外，其他幾家大出版機構如中華書局、世界書局等，為了與之競爭，也以叢書的方式大規模重印古籍，³⁹結果竟引發了一場古書的重印運動。⁴⁰這正應了呂思勉所說的：「夫資本之為物，其趨於利厚之處，若水之就下」。⁴¹無論如

33 呂思勉，〈三十年來之出版界〉，頁383。

34 呂思勉，〈三十年來之出版界〉，頁383。

35 王雲五，〈十年來的中國出版事業〉，收入氏著，〈新目錄學的一角落〉（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民62），頁260。

36 呂思勉，〈三十年來之出版界〉，頁384。

37 「國學基本叢書」細目及出版資料，詳見上海圖書館編，〈中國近代現代叢書目錄〉（香港：商務印書館香港分館，1980），頁677-686。

38 「學生國學叢書」和「國學小叢書」之書目及出版資料，詳見上海圖書館編，〈中國近代現代叢書目錄〉，頁668-673、709-711。

39 朱聯保，〈近現代上海出版業印象記〉（上海：學林出版社，1993），頁89、140。

40 戴仁（Drege, Jean-Pierre.）著，李桐實譯，〈上海商務印書館1897—1949〉（北京：商務印書館，1996），頁116。

41 呂思勉，〈三十年來之出版界〉，頁382。

何，這些書籍的出版，對「整理國故」聲勢的壯大，扮演了至為重要的角色。

當時商務所以接連推出三套國學叢書，主要出於王雲五（1888—1979）的規劃。雖然在王氏於1922年入商務任編譯所所長之前，商務同人憑著出版業對學術風潮轉變的靈敏嗅覺，已有人提出「整理舊書」的構想，⁴²但事未果行。要到王雲五主持編譯所後，才有大規模發行國故叢書之計劃。而王雲五所以如此積極於「國學叢書」的出版，推薦他入商務的胡適實有獻策規劃之功。事實上，商務「學生國學叢書」的出版計劃，可以說是在胡適提議下，由王雲五於館中配合推出的。

早在1920年，商務爲了跟上五四後學術思潮發展之新動向，希望物色若干「新人」入館，以洗刷人們以商務爲保守落後的印象，而所欲延聘之人即爲新文化運動的主將胡適。⁴³1921年夏，胡適在編譯所所長高夢旦（1870—1936）堅邀下，從北京到了上海，參觀商務並會見館中同人，針對商務之組織與出版方針提出意見。由於胡適當時正熱心提倡「整理國故」，故對館內人員華超所撰〈改革編譯所芻議〉中談到「整理舊書」一段，特加注意。⁴⁴在參加編譯所會議時，胡適復因一年前已認真思考中學國文教學的教材問題，故當場建議同人於《中學國文讀本》之外，應「多設法編一些中學國文參考叢書」，⁴⁵此即後來胡氏建議出版「學生國學叢書」之芻議。

及至胡適在同年將王雲五薦入商務主持編譯所後，⁴⁶憑藉著和王雲五的私

42 社科院近史所編，《胡適的日記》，1921年7月21日條下，上冊（北京：中華書局，1985），頁151。

43 子治，〈梁啟超與商務印書館〉，收入商務印書館編，《商務印書館九十年》（北京：商務印書館，1987），頁504。

44 《胡適的日記》1921年7月21日條下，記有華超所擬之〈改革編譯所芻議〉，其中談到「整理舊書」一段，胡適在日記中詳加摘錄如下：「整理舊書。照原書印成，沒加上整理、考訂、校誤和說明，不能算作大貢獻。以後印行舊書，宜聘專家來整理，可另置舊書整理部以統其事。」社科院近史所編，《胡適的日記》，上冊，頁151。

45 社科院近史所編，《胡適的日記》，1921年7月20日條下，上冊，頁149-150。

46 關於胡適薦王雲五入主商務編譯所之原委經過，參陳達文編，〈胡適與商務印書館〉，收入商務印書館編，《商務印書館九十年》，頁575-8。王雲五，《岫廬八十自述》（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民56），頁77-8。

人關係，胡適對商務之出版方針更是多所建言。關於胡適促使商務出版國學叢書一點，從1922年9月14日王雲五致胡適的一封信函中，可以看得非常清楚。王氏在信中這麼說：

你的〈中學國文教學〉，我們都很贊同……。其中關於整理舊書一段，不但裨益教育，並且確是一大利源。又所開七條件，也很周密妥善。我以爲商務亟當照此進行。不過人材難得，恐不易辦到美滿。在商務裏面找出幾個人擔任這事，實在不容易；不知你能夠介紹些人在所外幫忙否？⁴⁷

從胡適的日記可以曉得，王雲五此函其實是對兩個月前胡適給他的一封信之答覆。就王氏回函的內容來看，胡適給他的那封信乃是論到「整理舊書」之需要和構想。而王氏函中特別提及的〈中學國文教學〉，顯然指的是一個月後胡適公開發表的一篇文章——〈再論中學的國文教學〉。⁴⁸在那篇討論中學國文教學的文章裏，胡適提出了「整理古書」在教學上之必要，並具體列出「整理古書」所應包含的七項「必不可少」之條件，認爲唯有經過一番整理的工夫，教育文化界才可以得到一套包含「幾十部或幾百部整理過的古書」的「中學國故叢書」，以解決中學古文教授時教材缺乏的問題。⁴⁹而上引王雲五給胡適的信，又透露出胡氏在該文寫定以前，已將這一構想先行函告王雲五，希望獲得商務的配合；王氏之覆函，即詳論此事之可行性。

另一方面，從王雲五給胡適的回信，再加上〈再論中學的國文教學〉之內容，可以清楚看出下列諸事：第一，王雲五對於胡適「整理舊書」的意見極表

47 王雲五，〈致胡適函〉（1922：9.14），收入社科院近史所編，《胡適的日記》，1922年9月16日條下，下冊，頁457-8。

48 1920年，胡適已開始思考中學國文教學的問題，於該年3月撰有〈中學國文的教授〉一文，提倡學生當以自修的方式，自行閱讀古書。兩年後，胡適復撰〈再論中學的國文教學〉，承認兩年前提出的自修古文之理想不能實施，而其原因即由於許多古書不論就版本還是校勘訓詁來說，皆未經過一番「新式的整理」，「至今還只是一筆糊塗帳」，故不便於自修。參胡適，〈再論中學的國文教學〉，收入氏著，《西游記考證》（臺北：遠流出版公司，1994），頁178-179。

49 胡適，〈再論中學的國文教學〉，頁179-181。

贊同，認為應列為商務之出版計劃。第二，不但商務日後所出之「學生國學叢書」，確是依胡適的構想出版；而且胡適為「整理舊書」所列的七項條件，也成為商務進行這項工作時依循之準則。無怪乎顧頡剛說：「整理國故的呼聲倡始於太炎先生，而上軌道的進行，則發軔於適之先生的具體的計劃」。⁵⁰第三，商務願意發行這套叢書，在「裨益教育」的考量外，還因了解到這是一門會賺大錢的生意，而後一項恐怕還是王氏決定時的主要考慮因素。事實上，胡適在致王氏之信中，就特別從商業利潤的角度，指出該計劃可為商務開「一大利源」。不但如此，王雲五在回函中更憑藉其商業洞察力，進一步提出應擴大國學圖書市場於中學生以外。⁵¹其後，商務在王氏主持下，終於一面照胡適的建議推出「學生國學叢書」，同時也另外出版了一套「國學小叢書」，「整理國故」的工作乃在出版業中轟轟烈烈的展開。

曹聚仁（1900—1972）早已指出：一部近代文化史，從側面看去，正是一部印刷機器發達史。⁵²觀察「整理國故」運動的發展過程，可以看出近代學術文化發展與出版事業之間，的確有著緊密的依存關係；而商務印書館的配合，尤其是促使「整理國故」運動擴大且持續發展的重要因素。商務憑著從清末發行教科書以來所累積的龐大資本、印刷技術的精進、推銷書籍的豐富經驗（刊登廣告、散發宣傳品、發售預約）⁵³、以及健全的發行網絡，在民初早執出版界之牛耳；這樣一個「出版工業」一旦與新興學術思潮相結合，就具備發動並推廣一場全國性學術文化運動之條件。⁵⁴

對商務在知識界的這一力量，五四以來即居於新思潮浪頭上的胡適，看得極為清楚。胡氏在20年代初即謂：「得著一個商務印書館，比得著甚麼學校更

50 顧頡剛編，《古史辨》，第1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頁79。

51 王雲五，〈致胡適函〉（1922：9.14），頁458。

52 曹聚仁，《文壇五十年》（上海：東方出版中心，1997），頁83。

53 章錫琛，〈漫談商務印書館〉，收入商務印書館編，《商務印書館九十年》，頁122。

54 1923年，呂思勉在展望出版業之發展前景時，就已指出：從印刷成本之降低、支店之廣泛開設、廣告之大量刊登三方面合而觀之，「今後廣印書籍，以宣揚文化之責，殆十之九集於有大資本之書店，非虛言也。」呂思勉，〈三十年來之出版界〉，頁383。

重要」。⁵⁵又說：「這個〔商務〕編譯所確是很要緊的一個教育機關，——一種教育大勢力」。⁵⁶雖然胡適始終未在商務擔任正式職務，但他於1921年夏南下期間，既與商務高層建立了良好的關係；爾後出任該館編譯所所長（後又轉任總經理）的王雲五，復出於他的引薦。憑藉著與商務有順暢的溝通管道，胡適有意識的把「整理國故」之理念，與商務作為一個出版機構所須考量的商業利益作了巧妙的結合，結果遂使國故整理的工作，在幾個學術機關以外，擴大為一場由出版業主導的、以文化普及為特色的運動。當然，胡適個人在知識界中的領袖地位，也因而更為強固了。⁵⁷

值得一提的是，從20年代下半期開始，由於在「整理國故」運動中扮演推波助瀾角色的商務、中華、亞東等，其總行皆設在上海，因此就地域上看，觀察這場運動從形成到擴展的過程，可以發現它的口號先是在北京喊出，然後藉由京滬兩地報刊雜誌的響應，得到了全國知識界的注意；由於上海出版界對學術新風潮的洞悉先機，再加上胡適這些學術名流的鼓動，幾個大書店皆策劃了大型的出版計劃，遂使新一波以文化普及為特色的「整理國故」運動，演變成以上海為中心，呈輻射狀發散到全國各主要城鎮。

這是因為自近代出版業在中國誕生以來，上海一直居於中心地位，重要出版機構皆集中於此。至20—30年代，這些機構為了擴大銷售網，已相繼建立起頗為健全的發行網絡。⁵⁸當時它們推銷書刊的策略大致有二：（1）在全國各主要城市開設支店，直接銷售上海總行出版之書籍。如商務在30年代以前就已在於全國三十餘個城市陸續建立了分館、支館和支店；⁵⁹20年代初，商務復成立

55 社科院近史所編，《胡適的日記》，1921年4月27日條下，上冊，頁24。

56 社科院近史所編，《胡適的日記》，1921年8月13日條下，上冊，頁185。

57 沈松儒，〈一代宗師的塑造——胡適與民初的文化、社會〉，收入周策縱等，《胡適與近代中國》（臺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民80），頁154。

58 就江蘇一省而論，論者指出以上海出版業為主導的書刊發行網絡之形成，即在1927—1937年間。張憲文主編，《江蘇民國時期出版史》（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3），頁242-4。

59 〈商務印書館總分支館局一覽表〉，參見莊俞，〈三十五年來之商務印書館〉，頁748-750。

「通訊現購處」，經營郵購，以便利內地讀者購買圖書。⁶⁰其他像20年代始成立的世界書局，也追步商務之後，幾年內就在全國二十個主要城市設立支店。⁶¹（2）與各地書店合作，委託其代為經銷在上海出版的書籍。像商務、中華、世界、中央、開明、亞東等具規模的出版機構，皆透過這種方式將其銷售網拓展至全國各大中型城鎮。⁶²以規模中等的亞東圖書館為例，在其業務全盛時期的30年代中葉，單是國內代售處就遍佈二十個省的一百七十多個城鎮。⁶³而作為中國出版業老大哥的商務，其發行網據說更深入到農村裏去。⁶⁴正是上海出版業的這些發行網絡，將各種知識傳佈於中國內地，由此構成一全國性的資訊流通網；而「整理國故」的理念，也就是透過這樣一個文化網絡，在20年代下半期以後達到全國各省之大中型城鎮。

由於上海出版業具有如此廣闊的發行網，越來越多北京和各地高等學府及學術團體為了傳佈學術理念、發揚學術成果，紛紛與大規模的書店合作，委託它們代印代銷各種書刊。舉例來說：新文化運動之後，梁啟超在歐遊時與張君勱等組織共學社，欲以全力從事教育文化工作。梁氏及其同人認為，學術文化事業之開展，必須以商業資本為後盾，⁶⁵故在1920年返國後即由梁啟超主動與商務接洽，雙方訂定契約，由商務資助出版「共學社叢書」十七種。⁶⁶至於北大方面，同人雖曾有由校方自行出版叢書之構想，如計劃發行「北京大學國故

60 曹冰嚴，〈張元濟與商務印書館〉，收入商務印書館編，《商務印書館九十年》，頁32。

61 戴仁著，李桐實譯，《上海商務印書館1897—1949》，頁53-4。

62 張憲文主編，《江蘇民國時期出版史》，頁126、243-4、255-6。

63 〈1934年亞東圖書館國內外代售處一覽〉，收入汪原放，《回憶亞東圖書館》，頁232-9。

64 曹聚仁，〈上海丁記〉，收入紹衡編，《曹聚仁文選》，下集（北京：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5），頁463。不過，對於上海出版機構之發行網實際所能到達的地方層級，在作深入的調查研究以前，似不宜過份高估。事實上，在廣大的農村地區以及小城鎮，許多在資訊上是極為閉塞的。參余英時，〈我所承受的「五四」遺產〉，收入氏著，《中國文化與現代變遷》（臺北：三民書店，民81），頁89-90。

65 丁文江，趙豐田編，《梁啟超年譜長編》，頁1012-6。

66 子治，〈梁啟超與商務印書館〉，頁503-6。

叢書」及「北京大學國故小叢書」，⁶⁷然終因經費支絀而未能辦成。因著北大校長蔡元培與商務元老張元濟的深厚交情，雙方遂於1919年訂定合約，此後北大教授之著作多交商務出版。⁶⁸至1923年，商務更與包括北大在內的多所大學、學術團體簽訂出版叢書之合約，⁶⁹奠定彼此合作的基礎。

由此可見，從北大學者的提倡到上海出版界的響應，「整理國故」運動的開展，在在顯示出五四後一種知識傳佈的新形態。從知識產生與傳播的角度來看，當時北京學術機構與上海出版業在「整理國故」運動中所分別扮演的角色，實為一種文化機制內之分工。北大等學術機構作為知識的產生地，以學者教授為中心；上海出版業作為知識的傳播媒介，以編輯人員為核心，二者基本上各自發展。五四時期，陳獨秀把《新青年》帶到北大來辦，並組成以北大教授為班底的編委會，開始打破二者間之隔閡。20年代以後，因一流學府及高級學術機構多集中在北京，致該地顯然成為全國共仰之學術中心；⁷⁰而出版事業方面，上海由於累積了清末以來長期發展的基礎，為印刷及出版業之大本營；是以北京與上海之間，遂含有相當濃厚的文化區域分工之意味在。

四、國學書籍的「速成化」、「大眾化」和「通俗化」

當「整理國故」在中國已經擴大成一場全國性的學術文化運動，以致青年學子群趨國故研究一途後，對「整理國故」運動的形成及擴大發揮過重大影響力的胡適，卻逐漸對許多人存「衛道」、「覓寶」的態度，在研究方法上卻缺乏訓練而深感憂慮，故先在北大國學門同人的集會上表示他的擔心，其後又在

67 社科院近史所編，《胡適的日記》，1921年8月13日條下，上冊，頁281。

68 高平叔，〈蔡元培與張元濟〉，收入商務印書館編，《商務印書館九十五年》，頁572-4。

69 王雲五，《商務印書館與新教育年譜》（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民56），頁133-4。

70 楊東平，《城市季風：北京和上海的文化精神》（上海：東方出版社，1995），頁139-144。

同人鼓勵下於1928年撰〈治學的方法與材料〉一文，⁷¹呼籲年輕人應在整理國故的道上「及早回頭」，多學一點自然科學的知識與技術；等到在科學實驗室裏有了好成績以後，再拿出餘力來整理國故，到時所得之成果當遠邁前人。⁷²

胡適這篇文章發表後，對正如火如荼開展之「整理國故」運動起了相當的降溫作用；⁷³此外，部份學者對「國故」、「國學」這些概念的批評，⁷⁴也使一些學術機構逐漸放棄「國學」這種籠統的學術稱謂，而改就文史哲這些部門進行分科研究，致「整理國故」運動在30年代初開始有退潮的跡象。⁷⁵其中，北大研究所在1932年將國學門改稱文史部，⁷⁶尤其可以作為一項指標：說明學術界主流在治學方法方面，雖然大體仍依循「以科學方法整理國故」的路子走；⁷⁷但在學科概念上，他們在歐美現代知識分類概念影響下，已視「國學」這一在學術體系轉化過程中出現的過渡性詞彙為不合時宜。⁷⁸

71 〈研究所國學門第四次懇親會紀事〉，《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月刊》，1卷1號（1926：10）頁144-7。

72 胡適，〈治學的方法與材料〉，收入氏著，《治學的方法與材料》，頁156。

73 如在20年代積極鼓吹「整理國故」的曹聚仁便說，胡適這篇文章使他「從整理國故的圈中跳出來」。曹聚仁，《我與我的世界（下）》，頁278。

74 陳獨秀、洪業、何炳松、傅斯年等先後批評「國學」、「國故」這些詞彙，認為它們指涉的範圍既不清晰，又易產生流弊。參：獨秀，〈寸鐵〉收入：任建樹等編，《陳獨秀著作選》，第2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頁516-7、604。陳毓賢，《洪業傳》（臺北：聯經出版公司，民81），頁157-8。傅斯年，〈史語所工作之旨趣〉，《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1本第1分（1928），頁8-9。何炳松，〈論所謂「國學」〉，收入劉寅生等編校，《何炳松論文集》（北京：商務印書館，1990），頁481-490。

75 桑兵認為20-30年代前期為國學研究的鼎盛期；30年代以後，國學研究乃漸漸消沈。桑兵，〈晚清民國時期的國學研究與西學〉，頁36。

76 《國立北京大學志》編纂處編，《國立北京大學校史略》（北京：《國立北京大學志》編纂處，1933），頁251。

77 到了40年代初，有人觀察其時各大學研究所之學報專刊，認為依然是「整理國故」一派之流風。林同濟，〈第三期的中國學術思潮—新階段的展望〉，收入：溫儒敏，丁曉萍編，《時代之波—戰國策派文化論著輯要》（北京：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5），頁321。

78 參拙著，〈〈國學季刊發刊宣言〉：一份「新國學」的研究綱領〉，收入黃清連編，《結網編》（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98），頁565-570。

然而就在這個時候，在上海出版業的運作下，各種「國學叢書」及各種通論性、常識性國學入門讀物之編寫出版，在30-40年代還是持續發行。且不說商務三套國學叢書之發行於30年代方到達高峰期，一般出版商也多在30年代才陸續推出各種以「國學」為名的「叢書」。現據《中國近代現代叢書目錄》所錄，表列30-40年代，各出版機構推出的標榜「國學」或「國故學」之「叢書」資料如下⁷⁹：

出版機構	叢書名稱	書冊種數	出版地點	出版年份
中國文化服務社	青年國學叢書	5	上海	1936
亞細亞書局	青年國學叢書	1	上海	1932
春江書局	國學入門叢書	9	上海	1938-1942
大東書局	國學門徑叢書	8	上海	1931-1933
文殿閣書莊	國學文庫	49	北平	1933-1937
龍虎書店	國學叢書	1	上海	1935
達文書店	國學叢書	1	上海	1937
新文化書社	國學叢書	2	上海	1936
正中書局	(1) 國學叢書	8	南京/	1936-1947
	(2) 國學叢刊	15	上海/	1936-1947
	(3) 國學匯纂叢書	9	重慶	1943-1948
中央書店	(1) 國學珍本文庫	23	上海	1935-1948
	(2) 國學基本本文庫	11		1935-1936
國學研究社	國學珍本叢書	10	上海	1935-1936
大達圖書供應社	國學基礎叢書	2	上海	1935
大華書局	國學基礎叢書	1	上海	1933
時代書局	國故學叢書	2	上海	1925、1937
群學書社	國故學叢書	1	上海	1930

79 上海圖書館編，《中國近代現代叢書目錄》，頁155、604、668、673-677、686。

發行上述叢書之出版機構，有的規模極小，刊印書冊之種數亦不多，而皆爭相推出「國學叢書」者，都是想在圖書市場中分一杯羹。至於其他在30年代以後出版、不稱「叢書」而亦標舉「國學」之名的書刊，其數亦復不少。⁸⁰這些書刊的發行，說明這場由北京知識界上層發起的學術文化運動，在上海書賈加入後，其後續發展已非高等研究機構中的知識菁英所能左右。再進一步說，30年代以後北京學者與上海書賈對「國學」一詞所採截然不同的態度，也顯示出當普及教育在中國推行有年、知識人口有了長足增長以後，⁸¹此時知識界內部開始呈現一種分層化的現象。

關於知識界的分層化問題，本文無法在此詳加討論。爲了論述的方便，這裏姑且對30—40年代中國之知識界作如下劃分：（1）上層（知識生產者）：以北京高等院校和學術機構中之教授學者爲主，也包括少數出版社及報章雜誌之高級編輯人員；（2）中層（知識傳遞者）：以上海及各省報社及出版業之中下級編輯人員、全國大部份中小學教員爲主；（3）下層（知識接受者）：以全國大、中、小學學生爲主，還包括社會中從事各種職業的識字人口。⁸²當然，上述分法並不意味著一種界限分明的絕然劃分，然而大體來說，不同「階層」的人，其教育背景、職業身份、社會地位、活動地域皆不相同，其在知識領域中所表現出來的觀念、趣味及傾向，也存在著相當的差異。

30年代以後，從北京學者對「國學」一詞的批評，以之與上海出版業對「國學」書籍之照出不誤兩相對照，反映出當時知識界上層與中下層之間確實

80 參北京圖書館編，《民國時期總書目（1911—1949）：綜合性圖書》（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95），頁136、153。四川省中心圖書館委員會編，《抗日戰爭時期出版圖書聯合目錄》（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1992），頁1643-5。

81 辛亥時期，中國國內學生總數就達到三百萬人左右。桑兵，《晚清學堂與社會變遷》（臺北：稻禾出版社，民80），頁158。

82 近來研究者也漸多注意到近代知識人口膨脹後，知識界內部所出現的分層化現象，並各用不同的名詞區分之。例如陳永發有「大知識分子」、「小知識分子」、「半知識分子」的說法。羅志田有「上層知識分子」和「邊緣知識分子」之劃分。參陳永發，《中國共產革命七十年（上）》，（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99），頁133-9。羅志田，〈失去重心的近代中國：清末民初思想權勢與社會權勢的轉移及其互動關係〉，收入氏著，《民族主義與近代中國思想》（臺北：東大圖書公司，民87），頁174-187。

存在著相當的距離。固然，「整理國故」的概念是由北大教授們首先喊出，並藉由上海出版業的響應而在知識界擴展，整個「整理國故」運動可以說是在他們合力下造成的；然而當知識界上層由於知識理念的轉變而放棄「國學」此一概念時，出版界基於商業利益的追求，其經營無法不表現出「市場導向」的一面，⁸³與知識界上層的脚步便不能完全一致了。實則當時書商所以仍使用「國學」這一備受知識界上層批評的詞彙，大概主要考慮到該詞使用已久，對讀者仍具吸引力之故。在國學書籍之發行已全面商品化的情勢下，就算學者在學理上對「國學」一詞提出質疑，出版商也不願隨便丟掉這塊會賺錢的招牌的。

再者，由於國學書籍之傾銷對象主要爲學生與社會上識字的大眾，故其內容除部份屬古籍重印外，他如時人爲古書所作的標點分段和注釋，以及概論性入門書籍之編寫，大抵皆走文化普及的路子，使它們與北京學者所作的「窄而深」之考證文章頗異其趣。當胡適在北大提出「整理國故」的口號時，他本希望同人能往「提高」的方向努力，⁸⁴後來北京學者的研究，也確實表現爲一種少數知識菁英所撰寫的以考證爲特色之文章。然而到商務等出版社發行「學生國學叢書」及「國學小叢書」時，考慮到市場係以學生爲主要對象，其內容遂多具通論之意味，偏重知識的普及一層面。

事實上，當胡適基於中學國文教學之考慮號召青年學子起來「整理國故」時，他也是站在文化普及的立場，指出：「國故的研究，於教育上實有很大的需要。我們雖不能做創造者，我們亦當做運輸人。這是我們的責任，這種人是不可少的」。⁸⁵同時提出：「整理國故的目的，就是要使從前少數人懂得的，

83 商務在1916年便曾因擔心銷路不佳而不願印行章太炎的全集。高樹年主編，《張元濟年譜》（北京：商務印書館，1991），頁128。到了30年代，在商務任職的姚名達也曾抱怨說：「現在的職務是商業的，有時因了遷就資本而不免抹殺學問，這不是學者的最好環境。」姚名達，〈致胡適函〉（1930：11.17），收入耿雲志主編，《胡適遺稿及秘藏書信》，第31冊（合肥：黃山書社，1994），頁91。

84 胡適，〈提高和普及〉，收入氏著，《胡適演講集（二）》（臺北：遠流出版公司，1994），頁77-80。

85 胡適，〈研究國故的方法〉，收入氏著，《胡適演講集（三）》（臺北：遠流出版公司，1994），頁14。

現在變為人人能解的」。⁸⁶既然要做到使「少數人懂得的」，「變為人人能解的」，則書籍內容自不能走曲高和寡的路子。像商務出版的「小叢書」系列，其立意就是要「以深入淺出的方法，就萬有的知識，各別命題，分請各該科專家執筆」。⁸⁷其中「國故小叢書」，係收錄時人所編著關於經學、史學、諸子、文學、小說、詞章各種文體之概論，且一律以語體文撰寫，以為入門的預備。⁸⁸至於「學生國學叢書」之出版，也是「就我國古籍，每一種各選其精要，詳加闡釋，並於導言中說明全書大要，使嘗其一齒者，除細嚼其一部分外，並得窺全豹之外形與內涵」。⁸⁹是則這兩套國學叢書出版之原意，主要在示人以治學門徑，故其內容力避艱深，目的不在學術之創新發明，而重在文化知識的傳播延續。

除了大部頭叢書以外，當時各出版社推出之通論性及常識性國學書籍，大致上還可以分為兩類：一種是在書名中含有「概論」、「概要」「大綱」名稱之通論性讀物。據《民國時期總書目》所收，此類「概論」性讀物，30—40年代便出了約二十種。⁹⁰再者，在同類書冊充斥圖書市場的情況下，部份書籍還能一再重印，像章太炎講演曹聚仁筆錄的《國學概論》，從1922—1937年的十五年間便發行了二十一版，⁹¹皆因斯時全國大中學多採用此書為教本或參考書。⁹²而觀30年代後出版的「概論」性國學書籍，其封面時有如下題字：「高級中學、大學教本」、「供中學以上學生學習參考」、「高中師範科適用」、「供大、中學教學用」、「供中高等學校教學用」，⁹³可見其編寫大抵以大學、師範、中學學生為對象。

86 胡適，〈研究國故的方法〉，頁14。

87 王雲五，〈岫廬八十自述〉，頁79。

88 王雲五，〈致胡適函〉（1922：9.14），頁458。

89 王雲五，〈岫廬八十自述〉，頁80。

90 北京圖書館編，〈民國時期總書目（1911—1949）：綜合性圖書〉，頁136-143、146-7。

91 曹聚仁，〈我與我的世界（下）〉，頁465。

92 曹聚仁，〈中國學術思想史隨筆〉（北京：三聯書店，1994），頁3。

93 北京圖書館編，〈民國時期總書目（1911—1949）：綜合性圖書〉，頁147-150。

這類書籍的出現，是因為自20年代起，在「整理國故」風潮的鼓動下，中國各地大、中、師範學校都陸續開設了「國學概論」之類的課程，授課教師起初多自編講義，其後乃付諸出版。像錢穆的《國學概論》一書，即為其20年代於無錫省立第三師範及蘇州中學任教時，為學校所開「國學概論」一科而編之講義。⁹⁴因此到了30年代，市面上遂出現一批名為「國學概論」之書籍。

此外，從《民國時期總書目》所見，從20—40年代各出版社所推出之國學書籍中，還有一種是專門為應付考試而編寫的入門書。這些書常註有「考試必備」、「供高中學生高考參考」、「供高中生高考參考用」、「會考升學必備」、「升學考試必備」、「考試要覽」、「考試自修適用」這類字眼，⁹⁵是一種考試取向的國學常識書籍。由於其內容之編寫，是為了幫助學子應付全國高中會考「國文常識」一科而作⁹⁶，故銷路一般不錯，往往一再重印。像張振鏞編的《國學常識答問》，1936年出版後，三年內就賣了七版，銷路甚佳。⁹⁷

上述通論性、常識性國學讀物編寫之用意，顯然是為了使年輕學子能在短期內吸收一些國學基本知識，故內容大多重在介紹，「學術性」不高。事實上，包括上面提到的國學叢書在內，發行這類書籍的出版商為了搶奪圖書市場，往往由編寫到出版發行，過程都極為倉促，這一點即便是商務也未能避免。像胡懷琛（1885—1938）入編譯所後負責編寫「學生國學叢書」，兩年內就完成三本書的選注工作，而同時還另有三部著作出版。⁹⁸而除了館中職業編

94 錢穆，〈國學概論·弁言〉，頁1。至40年代，一些高中仍有「國學概論」一類的課程開設。參黃永年，〈回憶我的老師呂誠之先生〉，收入俞振基編，〈蒿廬問學記：呂思勉生平與學術〉（北京：三聯書店，1996），頁139-140。

95 北京圖書館編，〈民國時期總書目（1911—1949）：綜合性圖書〉，頁147-150。

96 北京圖書館編，〈民國時期總書目（1911—1949）：綜合性圖書〉，頁149。

97 北京圖書館編，〈民國時期總書目（1911—1949）：綜合性圖書〉，頁148。四川省中心圖書館委員會編，〈抗日戰爭時期出版圖書聯合目錄〉，頁1644。

98 胡道靜，〈我的父親胡懷琛與商務印書館〉，收入商務印書館編，〈商務印書館九十五年〉，頁259-262。

輯人員外，商務也約請外人撰書，⁹⁹上海及鄰近地區不少大學、師範及高中教員都曾賺取過這種「外快」以補貼家用。像錢穆執教中學時，便曾為商務以七日之力撰成《墨子》一冊，後又費旬日之功完成《王守仁》一書。¹⁰⁰寫作效率如此之高，自然是為了應付市場上的需要。¹⁰¹然正因其成書速、費力少，讓北京學者看在眼裏，不免留下彼皆「為名利而撰作」的印象。¹⁰²30年代以後，知識界中也有所謂「海派」和「京派」之分，多少與此有點關係。¹⁰³

括言之，20年代以後國學書籍之發行，不僅已成上海「書賈射利」之業，抑且為部份讀書人稻粱資斧之謀。而市面上越來越多通論性、常識些的國學書籍出現，也顯示出當「國學」被納入學校課程且成為考試內容以後，縱然「整理國故」已不再是大學教授們念茲在茲的課題，眾多青年學子卻仍在學校開設的「國學」課程中，學習那些業經通俗化、普及化的國學知識。於是「整理國故」的事業，遂在北京學者充滿「歷史癖和考據癖」的文字之外，¹⁰⁴出現另一種富有「速成化」、「大眾化」和「通俗化」氣息的書籍了。¹⁰⁵

99 當商務策劃推出「國學小叢書」及「學生國學叢書」時，原擬延覽北大教授「在所外」幫忙，故1923年委託胡適主要按新學制高級中學用書之需要，草擬了一份〈擬整理國故計劃〉，列出古書數十種，約北大同人分任整理。參胡適，〈擬整理國故計劃〉，收入：耿雲志主編，《胡適遺稿及秘藏書信》，第13冊，頁380-3。然終未成事，商務後來只好另外邀人承擔整理之責。

100 錢穆，《先秦諸子繫年·跋》，收入氏著，《錢賓四先生全集》，第5冊，頁699-701。

101 錢穆，《師友雜憶》，收入氏著，《錢賓四先生全集》，第51冊，頁143-4。

102 朱自清，〈論學術的空氣〉，收入朱喬森編，《朱自清全集》，第4卷（江蘇省：江蘇教育出版社，1993），頁490。

103 魏京伯，〈海派與京派產生的背景〉，收入馬逢洋編，《上海：記憶與想像》（上海：文匯出版社，1996），頁57-60。

104 朱自清，〈論學術的空氣〉，頁490。

105 「大眾化」、「通俗化」、「速成化」，皆錢穆對民國以後「學術界新風氣」之評語。參錢穆，《中國學術通義》，收入氏著，《錢賓四先生全集》，第25冊，頁312-3。

五、結論

向來學者觀察20世紀中國知識界的發展動向，常用「思潮」、「運動」這些字眼，來概括一些具有鮮明群眾意識之觀念，於是乃有「新思潮」、「國語運動」、「新文化運動」等名詞的出現。然而如果我們把視野擴大到近代以前，便可以發現：在中國學術文化領域中所出現的這些「思潮」和「運動」，其所以能在短期內一浪接一浪的興起，其實都是近代印刷業革新下的產物。因為唯有當新式印刷技術引入中國，報刊、雜誌、書籍以驚人的數量與速度印行，才使「思潮」與「運動」的出現成為可能。五四以後「整理國故」運動之產生並席捲全國，亦復如此。

從文獻資料來看，「整理國故」運動確為20—40年代中國知識界一場重要的學術文化運動。觀察這場運動從形成到擴大的整個過程，可以說明五四後知識界出現了下列幾個新的動向：首先，自新式報業在中國出現以來，本已為介紹新知、啓迪民智的主要媒介；而五四期間新湧現的各種副刊雜誌，更成為新學術理念得以迅速傳播的機制性因素，「整理國故」運動的形成便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其次，當北大在20年代初儼然成為全國學術中心之時，新式出版機構經過三十年的發展，亦逐漸形成以商務為首的現代「出版工業」，其大本營在上海。當時出版界雖以商業利益之謀求為第一要務，然而部份人也具有一定的文化理想，他們基於「有裨學者，兼利營業」的考慮，從20年代下半葉開始發行大量國學書刊，既壯大了「整理國故」運動的聲勢，也使上海繼北京之後成為傳遞「整理國故」理念的的主要基地。通過書籍發行網絡的建立，上海不僅成為當時全國資訊流通網的中心，也使30年代的中國初步形成了一個現代文化網絡。不但如此，從30年代以後上海書賈不顧知識界上層對「國學」的批評，繼續推出各類通俗性國學書籍，亦顯示出這場發端於北大的「整理國故」運動，經過出版界的配合介入，其後續發展其實已非少數知識菁英所能掌控，這也透露出此時知識界內部已出現頗為明顯的分層化跡象了。